

# 百年回忆容子自传（七）3

愿违，荷兰人全部被送往集中营，高阶和技术性职位则由日本人或印尼人代替。日军接管了像是港口、邮政机关等公家机构和单位。除了10万欧裔公民（还包括一些华裔公民）以外，还有8万名荷、英、澳、美軍士兵被送往集中营，在那里死亡率高达百分之13到30。

后来父亲知道我时常替船员买私酒，没有生气，只是已不允许我去摆烟摊了。我问母亲原因，母亲悄悄告诉我：“是妈妈不对，让你去卖私酒，那是会被捉的。”我“哦”了一声接着伸伸舌头。难怪酿酒那户人家，总是有个婶婶坐在屋前，熟客才让进去，出口处却是在另外一条巷。酿酒处也很隐蔽，不让任何人知道。即便这样他们的米酒还是供不应求，有次酒卖完了，要等上一个钟头。也许我还是儿童未加防范，得以跟随进去。走过左曲右弯，进到一个小房间，原来酒是从蒸笼里一条小管一滴一滴流出来的。酿酒房里有两个制酒蒸笼，酒装在瓶子里还很烫热。

在这悠闲的半年里，我照旧每周去买两条配给烟，卖给捐客赚些零用钱。

3  
我不再推车摆香烟，有空就帮忙居住在邻房船员叔叔们，他们早几个月已经做起“流动菜馆”来了。说起“流动菜馆”也有故事，自从欧阳叔叔等船员，从停泊港口邮轮逃上岸租房住下，过了半年无所事事，他们时常在商量“做什么好？”他们4个在邮轮上的工作，一个是西饼师，一个是西餐师，两个中餐师。也许他们就是从我的手推“烟摊”得到启发，就问我父亲能否做辆能炒菜的大辆手推车。大家在图样上各献谋划，“流动菜馆”手推车辆终于一个月做成。

日占时期物资样样由“军需”管制，猪肉鸡肉蔬菜如何才能买到？这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情。由我母亲通过菜市场的熟悉商贩，昂贵的黑市价，偷偷摸摸才能买到。当然他们的手推“流动菜馆”是个庞然大物。他们每天下午5点推车出发，每次出发需要三个人，两个厨师推车，一个人敲着空心木头穿街过巷“笃笃笃，笃笃笃”叫卖，有时不到12点卖完。“流动菜馆”几个月来，生意越做越好，但是原料难买，买不到的那一天就不得不停业。

有一次我也跟着“流动菜馆”手推车出发，手推车就像整个“厨房”，怎能不是“庞然大物”呢，推到

一个适当地点停下，有些常客远远听到“笃笃笃”敲木声，就先在那里等候。我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看到，把“厨房”推出外卖。“流动菜馆”炒菜时的锅香，飘香几条巷。“流动菜馆”过去未曾见过，足以证明海外华人三把刀“立足世界”“立于不败之地”。难道不是吗？

有这么一段船员佳话：战火燃烧，大船停驶。船员上岸，各寻生路。其中两位，上岸泗水，四顾迷茫。只好跟随大伙住进船员收容所。在船员难民所住了一阵，就迁居外面，商量着做点什么好？他们觉得卖熟食最适宜，本钱可大可小。于是他们就在泗水加里安雅（Kalianyar）桥河边，左支右绌合作做起菜馆来，兼卖烧鸡烧肉。权宜之计，菜馆搭得很简单，下雨不漏，有门关上就行。谁料熟食生意越做越旺，烧烤收入也不错。直到日本投降，流落异域的船员，听到轮船恢复航运，兴高采烈，纷纷报到，而他俩却选择留下。

久合必分，对他们也不例外，于是用抽籤方式厨房和烧烤分了家。分家之后，各自营业，依然旺盛，做菜馆的开了一间分店又一间分店；做烧烤的成了品牌，每遇过年过节或儿女满月，成为送礼首选，生意红红火火。这就是在泗水市人所皆知的“光明菜馆”和“ADAM”烧烤店。不过创业者先后去世后，又由于竞争者多，都已今非昔比大不如前了。

## （四） 俞校长冒险办学 华文教育不能掉

1  
一个讯息吹到我们巷里，说在Ngaglik街开办了一间新华小学。因为新开的这间学校距离我家很近，学校占地很大，学校前面是额克力（Ngaglik）大街，后面就是我住的巷子，倘若学校开一扇后门，进出有如邻居（可惜始终没有那扇后门）。那时我的年龄，称少年大了一点，说青年还够不上，旷课已久，我知道父亲正在考虑，是否让我进这间所谓“日伪”华校？母亲是文盲，对此根本说不上话，只说“让孩子多识几个字也好”。其实正是母亲“说不上话”而说的这句话，父亲才决定让我报名入学。母亲很高兴，她高兴的原因很简单，就是让我多识几个字。后来我听到父亲对来访的木匠阿

叔说，“要是让孩子掉了文化，就是掉了一辈子。”当初我不太懂父亲的话，现在细爵起来，父亲当时的话分明是说，中华文化灿烂数千年，失掉它就是失掉根，失掉一辈子。我佩服父亲！

我入读这间新华小学三年级（战后成为泗水最负盛名——新华中学校址）校长俞民新，班主任是校长夫人杨秀鸾老师，教日文的老教师是华人（名字已忘）40岁左右，个子不高、很健壮、从他身上穿的衣服看，胸肌也很宽，脸孔清秀、留着簿薄的胡子，为人沉静，一节日语课一半教日文一半讲故事。他告诉同学们当讲故事时，如果有人来巡视教学，要立刻把日文课本打开（同学们听了会意哈哈笑），这位日语老师讲的“苦儿流浪记”，故事很长，到日本投降学校停课时还没有讲完。学校也来了许多“特别生”，他们是从印荷教会学校转过来的。“特别生”年龄偏大，完全不懂中文，但他们的印尼文和数学都顶呱呱，而且很好学，学校按年龄把他们安插在各班。

“特别生”互相之间，初初还偷偷的讲荷兰话，只需一个学期就有了讲华语、写华文能力。“特别生”跟原本本校学生最大不同点，他们爱好体育运动。像我高一班的林忠和、林忠茂等多位，已是泗水中华足球队初露锋芒球员，跟我同班的几位“特别生”同学，如陈清山陈清林等也是该足球队后备球员。有次课余，清山同学玩他的足球，他叫3位同学拦他的球，他说不可撞身只可拦球，3位同学摆开阵势合力拦球，只见清山同学用脚把球左盘右盘，左脚一晃迷惑对方，右脚迅速突破拦阻把球盘了过去，旁观的同学看得拍掌叫好，3位拦阻同学更是目瞪口呆。

我在三年级的成绩并不好，而且读得很辛苦，由于学校为照顾“特别生”，把数学和印尼文课程提高，相对把中文课程放低，而我对印尼文完全陌生，甚至不懂什么是印尼文，所以我的印尼文成绩一塌糊涂，数学也只学过珠算式数学，成绩单上跟红色也很有缘份。给占时期小学只读了1年半，升到4年级时日本就宣布投降。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投降。这消息两天后才传遍巷子，巷里人有的还在怀疑，消息是否真实，更多高兴地在议论。“原子弹”是新名词，我不懂，不过在感觉上这东西似乎比孙悟空更厉害。俞校长在这次例行周会上，讲话时的神情和声调，好像变了一个人，不再

郁郁寡欢，而是兴高采烈；不再是声音低沉，而是高昂兴奋。他朗声地说：“同学们，日本投降了！祖国光复了！以后我们可以大声朗诵唐诗宋词了！现在我们的学校要停课，以后同学们可以回到原来的学校读书。”

这时场面一片杂乱，吵声四起，同学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只听校长继续说“以后日本人回到自己的国家，再没有侵略再没有战争，以后有更多的学校再开办，在菜市场里又可以买到新鲜的苹果了……”同学们听到这里一片欢腾，及后校长的讲话已被欢呼声淹没，讲些什么已完全听不到了。

给我印象较深的还是那些“特别生”同学，他们好学，他们并没有因喜爱体育而影响功课，他们只一个学期，华文程度就赶上原在华校就读的同学，他们连日语也用心学（这从成绩单上日语考试分数上知道）。此外，他们还有明确的学习目标。我曾偷偷的问过跟我同桌的“特别生”同学：

“战争结束，所有华校照开，你们特别生同学还回到教会学校读吗？”

这位同学拥有两道浓浓的眉毛，他那圆圆的肚皮也是一个特色，无论他站在哪里，人虽不高，但一看就容易认出。还有他个性好动，语言幽默，人缘极好，他告诉我，所有从教会学校转学过来的学生，都会回到原校。毕业后有的考法学系、医学院等等。

“那么你呢？”我再问。

“我要考医学院，我要当医生。”他说完那两道墨黑的眉毛一扬，又作了一个滑稽动作，性格乐天。

（1998年苏哈多政权倒台许多年后我听到东义里市朋友说，他们那边医院来了位新院长，华人，会讲华语，人

很风趣，有两道浓浓的眉毛。我心欣慰，心想一定是他。）

2  
我从另一位同学听到，有些日本人被带到大巴杀市政厅前枪杀，血流满地，有的被砍了头眼睛还睁得大大的。有人问这位同学是否亲眼看到？“没有，我听大人们说的，他们在那边看到。”同学回答。

回忆这段校园生活，免不了想起居住在学校里俞校长一家。俞校长为什么在日占时期办学呢？这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吗？从俞校长夫人杨秀鸾老师的讲课中，跟我在战前南华学校读书，没有什么两样，只多了日语课和拜一朝会唱kimigayu，由教日语老师站在台上指挥，然而，台下的同学有声无力，怎样也扬不起歌声，每次都草草结束。班主任杨老师喜欢打扮，穿著整齐，细描眉毛，脸上胭脂，口红薄唇。艳丽高雅。相反俞校长一身朴素，一年到头，长袖白衫。校长专注工作，倘不坐校长室，就是巡视教学。他家成员是（加上后来添加的）：大女儿俞一舟，大儿子俞昌乃，二儿子俞昌廷，二女儿俞一萍，三女儿俞一冰。

俞民新校长毕业于北京大学，1930年奉北大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蔡元培之令，接受泗水侨界的邀请，从中国下南洋担任泗水励志中学校长；1934年励志中学改制成为新华中学，俞民新担任新华中学首任校长，新中即当今泗水新中三语学校。

校长夫人杨秀鸾老师的出身也不简单：她父亲杨焜郡曾是新加坡胶业巨商，与母亲林玉心结婚后，育有八名子女：六位女儿、二位儿子。他将所有孩子送回中国就读陈嘉庚创办的厦门集美学校，所有孩子在第二次世

